

多元語境下的身份和價值取向

——論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中國化與國際化關係

子 夜

[提 要] 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出現，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歷史現象組合。本文針對多元語境下的身份和價值取向，討論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在處理中國化與國際化關係中的相關問題。由於傳播技術的革命性改進，多元語境呈現更加複雜的局面，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不但增加了更多的信息資源和信息優勢，同時又被迫面對一系列新的難題和挑戰。在持守學術科學本身獨立性的同時，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應充分利用自己在中國本土文化與世界交接中的特殊地位，為文明對話探索出新的路徑。

[關鍵詞] 華文學術期刊 多元語境 中國化和國際化 價值取向

[中圖分類號] C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3 - 0111 - 09

前 言

雖然作為文化研究的語境（context）提出較早，但大量地使用語境概念探討文化和學術研究，尤其是研究多元語境下的華文學術期刊問題，則是較近年代的事。討論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中國化與國際化關係，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前提和定位。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出現，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歷史現象組合，即在血緣於中國本土學術文化之根，卻又誕生或萌芽於海外，以華文為主要語言的學術期刊。從學術主陣來說，中國本土文化包含大陸和台灣兩大塊，因為，既使在政治和社會存在分歧乃至分裂狀態中，這兩塊地域在學術身處的話語背景（民族、文化、歷史等）和表達的基本工具（如語言、文獻資料等）兩大結構要素，基本上沒有發生大格局的質變。因此，所謂海外華文學術刊物，在廣義上可涵容為除這兩大塊之外所有的華文學術刊物，重點地區如東南亞、大洋洲、北美洲，同時，也包括已經主權回歸但同台灣情況有所不同的香港、澳門。香港、澳門兩地情況相對特殊，主要是其正處在動態的變化過程中，本身已經或正在擺脫歷史變故的後果，並且正在進一步轉型中（包括向中國本土文化的中心話語靠近）。但在目前情況下，這兩地的學術環境正是海外學術刊物面對的最典型的多元語境，這無疑又是中國本土文化與世界交流或

接軌的最恰如其分的橋樑。在空間上進行如此區分後，整體的所謂“海外華文學術期刊”這一範疇便得以廓清，有一種渾然天成、血肉相聯的感覺。同時，在這樣一種視野下，討論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身份認同及其作用，可以相對地從容和有的放矢了。

一、孤獨與獨厚：多元語境下的身份

在多元語境的背景下，明確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中國化與國際化關係，首要的一點是確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組合，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出現，有一種生存的孤獨。從近代到現代，當全球在追求經濟和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中，國際學術也進入最蓬勃發展的年代，而這個時期，恰是中國連年外患內亂。我們現在所指陳的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便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全球許多國家，都有以該國語言為主的海外學術刊物，但沒有出現過如華文海外期刊這樣長期甚至蔚為奇觀的現象。在中國文化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大進攻和挑戰中，首先產生於本土的學術期刊，在同西方進行比較的過程中持守本身的學術傳統，同時又極其寬敞地擴大自己的全球視野。但是，隨著長期的政治變化和動盪，以華文為主要話語體的學術刊物，出現了在海外尋找發展空間與生存陣地的現象。

正是因為這樣一種語境特點，我們現在所指陳的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概念，在主要層面上不涵蓋國內學術期刊的海外版。正如本文開頭所指，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歷史現象組合。所謂特殊的歷史現象組合，有兩個組合元素，一是作為五千年文明古國的中國在同國際交流中承擔的文化使命，二是承擔如此使命的一個大國在近代以來所遭遇的困境和尷尬。在海外形成一個文化上的中國，便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歷史現象組合的產物。“文化中國”泛指當今人類文明圈中的一種文化現象，乃至一種有意識的文化活動（運動），是以中華元素為特徵的文化圈，或曰中華文化圈。八十年代初，首先是海外的華人學者提出了“文化中國”一詞，認為除了政治上的中國、地理上的中國外，還存在一個文化上的中國。這是在世界人類中存在的中國文化，如華人集中或影響力較深的東南亞諸國，後來並包括華人足跡所至的歐洲、美洲、澳洲等，都不能否認實際存在一個無形卻是實在的文化中國。^①

在這種多元語境所沿革的歷史，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身份認同，顯然不能是國內學術期刊的海外版，同時，也不是西方語言（例如英語）學術期刊的中文版。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學術現象，是與中國、國際等學術鏈條中處於一個相對平等的環節。

所以，它往往是孤獨的——在海外強勢外國語言的包圍下，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資源和作用對象相當促狹，慘澹經營，舉步維辛，薪火相傳有一種悲壯的孤獨。同時，它又往往是獨厚的——正因為處在海外強勢外國語言的包圍下，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從一開始就要面對和學習語境的多元化。無論相比西方的外國語言刊物，還是相比中國本土的中文刊物，海外華文學術期刊都有一種獨厚多元語境的自身特點。

在身處強勢外國語言文字的語境中，儘管孤獨和悲壯，但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必須接受自己既不能是中國本土文化刊物的海外版，也不能是西方外語刊物的中文版這樣一個定位，它的身份必須反映自己在海外的相對獨立地位。

這個身份來自多元文化，來自多元文化大背景下的學術語境，即目前海外華文學術期刊表現獨特的多元語境。人類文明經過多種洗禮，從最初的以戰爭和爭奪解決生存和毀滅的選擇，逐

漸趨向通過各種非暴力手段進行交往和溝通（例如外交手段），總的一個走向，實質上就是相互認同，尋求對話，繼而通過對話走向理解和共贏。如有學者指出：“二十世紀是價值衝突的世紀。……從表面上看，價值衝突的原因是市場配額的不等，利潤瓜分的不公平，生息領地的有爭議和宗教信仰的有分歧。但從實質上看，一切衝突都根源於非此即彼、主客二分、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不相容價值抉擇。”^②西方社會目前越來越多國家認同多元價值，即本文下面要提到的“彩虹文化”（Rainbow Culture）或“馬賽克文化”（Mosaic Culture）。

多元本身成為一個特色，對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來說，不僅僅是一種色彩的綜合，而且為本來極為艱辛的生存空間帶來了更多思考和迴旋餘地。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歷史的沉積，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本土文化，不但由於社會、經濟、民族、政治的不同而存在的紛爭，導致學術觀點和派別的紛雜，一部分屬於正常的、自然的學術爭鳴，但有一部分則是明顯的宗派、政見的異同效應，這部分所形成的文化和學術內耗，會直接投射到學術期刊上。各國包括西方學術刊物，也不會完全避免這個現象，但中國本土文化在這方面的內耗及其資源的流失，可能更為觸目驚心。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可以同本土文化中有可能造成學術資源流失或失衡的內耗保持一定的距離。我們檢視一下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大部分都在致力於保持文化／學術的獨立性，十分珍惜和呵護自己在文化學術領域中的獨特角色。在這個問題上，謹守身份是最關鍵的要害。而且，謹守身份可以成為可能，正是獨厚於海外的多元語境的背景。孤獨與獨厚，便是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在多元語境下的身份。

二、價值與取向：多元語境下的選擇

語境從表面上看是文化尤其是文字表達的工具性的討論，但其背後蘊含的顯然是某種文化或文明的價值。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中國化與國際化關係，在定位明確之後，面臨的主要就是價值與取向的問題。

不容否認，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其特殊的語言表達方法在海外形成的不同吸引力，世界上存在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華文商業市場，涉及領域包括新聞傳播、圖書出版、影視藝術、華文教育等等。但是，我們清醒地看到，在世界各國已經或可能形成的華文商業市場上，顯然沒有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一席之地。本文第一部分所提的“孤獨”現象，在華文商業市場中尤其突出，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無法從商業市場中去獲取自己的地位。在多元語境環境下的海外空間，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唯一生存取向便是持守自己的價值取向。

（一）語境：消失的和重組的

就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本身的性質來說，語境問題，實際上應該關注的是其有兩個意義範疇。一是我們現在經常套用的狹義的語言條件和背景，即語言的種類工具、工具對象的區別（所謂主題）、信息表達的程序特點、語言在特定情景下使用的規律、相同或不同語言使用者之間的關係、特定人類群體（如民族）的心理和文化習俗差異，等等。二是從廣泛視域中觀察到的語境意義，即上一類狹義層面的語境意義，已經鋪墊了更廣泛意義的語境指向，不同的語言工具、對象的主題、表達的程序、特定情景下的關係、民族心理和文化習俗差異，這些元素最終會綜合成我們所稱之為特定文化和價值判斷。所謂狹義的或廣義區分，不是對語境簡單的區分或分類的隔離，事實上是整個語境意義的綜合。例如，我們現在談到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語境特點時，經常會困惑傾向於哪一種語境，是高語境的？是低語境的？就特定的“海外華文學術期刊”這個概念

來說，假如說我們傾向於高語境，那麼，又如何體現“海外”的特點？假如說我們傾向於低語境，那麼，又如何體現“華文”的特點？我們無法自圓其說地認為，由於中國學術期刊正在逐步國際化，這兩種不同的語境的差別正在消失，或者以某一種方法在重新組合。事實上，因為語境和國際化在某種意義上不能相比提論，何況目前為止尚未看到這種融合出現。我們卻可以很清醒地看到，高語境和低語境之分，恰恰是整體文化或民族思維的不同和差異所形成的，其背後實際上隱藏著不同文明或價值判斷的區隔。起碼在我們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區隔是不會消失的。

區隔不會消失，於是面臨一個重組的問題。由於不同語境的區隔不會消失，這就使海外華文學術期刊面臨一個非常微妙的境地。這種情況使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無法在語境中作出更多的選擇，例如，在所謂的高語境和低語境的糾結中，我們不一定非彼即此，有我無你，而是揉合兩者，貫通兩者，高中有低，低中有高，自己營造一種體現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語境。同時，正如上文所提，語境差異的背後，實際上折射了或隱藏著不同文明或價值判斷，從要害上說，是涉及了價值判斷和文明取向的深層，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多元語境的重新組合。這一點，恰恰是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可以發揮的地方。

筆者不想輕易地使用“文化產品”這個術語，但因為要相對於或襯托於其它文化活動，那麼，如果說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也是某種文化產品的話，則正如上文所說，這是整個海外華文市場無法立足的唯一事物。在排除了商業市場取向外，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取向則變得相對單純——價值取向，可能是唯一的取向。

（二）從個別價值觀走向共同價值觀

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在世界各國或地區中的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在領域分類中，與中國大陸和台灣並不相同，即沒有嚴格的專業分類。海峽兩岸的華文學術期刊，除了一部分綜合性的社會科學刊物，還存在大量的專業領域學術刊物，包括人文科學的各方面（文、史、哲等），自然科學的各專門領域，如醫、工、理、農等，而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大部分均為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性質，自然科學專門領域的學術刊物並不多見。這裡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在於資源的不足，可能更重要的是各自負擔的使命不同。無論如何，在中國本土的學術領域同外部各國的學術領域之間，存在一個必須由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承擔使命的廣闊空間，注定了綜合性的論域將是其最適合的論述對象。在這種論述對象特定限度和規定中，多元語境便促使海外華文學術期刊進行價值的取向和類比，在帶動中國同世界的接軌中，注重比較、磨合、吸納、融合、溝通，從個別的價值走向共同的價值。

多元語境下的價值取向，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折射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係。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價值與取向方面，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恰恰面臨著中國傳統文化所處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矛盾處境。“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主張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統一，即主張在統一和結合中，把握人的生存意義、終極價值和人的生存手段、謀生工具，而不同意將二者分離開來、對立起來。這種結合意識，具有鮮明的文化優勢，對人類邁向新的世紀，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④中國文化有一種明確的優勢，就是統合，包括價值與工具的統合。由於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主要不是以分類領域的專業刊物，而主要是綜合的人文主題，當然也更多體現在這種統合上所發揮的優勢。

從目前來說，中國正在快速地擺脫與世隔絕的局面，進入全球格局。海外華文學術期刊面臨著“五四”以來從未見過的價值衝突和判斷，在維繫中國傳統價值和融入全球化的磨合中艱難地

進行自己的選擇。對於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來說，非此即彼的“選邊”已經不可能在多元語境下形成價值取向的模式。就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本身的身分和地位來說，也許選擇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取向。

（三）推動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觀

圍繞近年海外學術期刊所關注的主題，在價值取向的選擇中涉及到重大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幾乎都是“五四”以來積蓄而又有待回答的，就是中國語境的獨特性和全球語境多元化的融合性。我們失去了什麼？我們又建構了什麼？中國文人長時期在自卑和自大之中來回搖擺，或者無視外部世界的發展，或者忘卻自身內部的經驗教訓。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缺少對話。因此，對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來說，推動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在多元語境下的價值取向。

美國L.斯維德勒教授在其著名的《全球對話的時代》一書中，曾有一段話：“在過去，從人類一開始，我們一直總是同自己談話，也就是說，我們總是同像我們一樣思考或者應當像我們一樣思考的那些人談話，我們總是唱獨角戲。在過去一個半世紀裡，我們慢慢地向一種祛除真理絕對化的方向移動，我們慢慢地開始意識到，任何個人，任何一個團體、文化、宗教或文明都不能表達出全部關於特殊的實在，特別是關於終極實在人們所知道的東西。因此，我們正在開始意識到，我們必須進入與那些思想和我們不相同的人的對話中，不是教給他們真理，而且去學習更多的單靠我們自己不可能了解的實在，我們正不可避免地進入對話。”^④

對話就是多元語境背景下處理不同文化衝突的第一步。學術刊物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特定立場，但這種特定立場不能是某種特種群體或派系的狹窄域界。學術刊物也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特定價值取向，但這種特定價值取向也應是廣泛的能容納具有同類質比而彼此能互相吸納。從上世紀末，尤其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之後，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已經注意到國際間關於價值觀的爭議，實際上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缺少對話的渠道。所以，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不約而同地倡導在多元語境下的對話和聆聽。許多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在選題和版面安排上，導出“對話”作為期刊的主要行為方式，努力營造多元語境和諧相處的氛圍，致力於以對話取代暴力手段（包括權力、語言暴力）的矛盾解決方法，這個時期海外期刊的一個特徵是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言論、文字和觀點的交流，這種平等，包括空間的，時間的，資源的，主事者有一種這是構成文明對話基本前提的共識。目前世界的知識傳播出現了一系列新的情況，而曾經以造紙術、印刷術推動世界文明進步的華人世界，同樣可以期待經過當代新技術、新知識的洗禮，為世界文明對話作出新的貢獻。震驚世界的“九一一”恐怖主義襲擊發生後，文明衝突從理論估計變成恐怖現實，從而促使學術界更加對文明對話予以重視並持續開展。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進行一系列推展的對話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推動象徵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文化與伊斯蘭文明的不同信仰進行對話。在這個影響下，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擴展了包括基督教領域、伊斯蘭教領域、儒家領域、道家領域、佛教領域作為對話的空間。這是一種更加廣泛的多元語境。同時，“對話”成為學術交流甚至擴而大之的文化交流、社會處理的一種理性價值和共處模式。對話當然是不同價值取向的交流和交鋒，但對於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來說，在多元語境下，這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性的取向。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在對話領域的開拓和努力，其在國際文明交往中的意義不應低估。

三、此岸與彼岸：多元語境下的參與

多元語境的背景就是一種語境重組的過程。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由於自己的身分和地位，永遠

不可能在此岸和彼岸之中作出選擇。我們在本文開頭便鮮明地提出，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既不是中國本土文化的海外版，也不是外國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中文版。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是既血緣於中國本土學術文化之根，卻又生於海外以華文為主要語言的學術期刊，是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組合。在學術領域，整體的所謂的“海外華文學術期刊”這一概念，是一種有渾然天成、血肉相聯感覺的特別空間。它既是多元語境下的參與，又是有自己獨特的語境。就如橋樑，它可以聯結此岸與彼岸的不同空間，但是，誰也無法將其定位在此岸或彼岸的某一空間，它本身就是一個誰也無法取代的性質空間。我們不能否認，這將是討論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中國化與國際化的關係中非常關鍵的一種判斷。

（一）對話空間的成熟

不同語境重組成一種新的語境空間，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在這種空間中，實質擔任的是橋樑和溝通的角色。我們在上文中特別談到，對話在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中的重要性。從目前來看，這種對話空間正在成熟。有學者指出：“二十世紀是價值衝突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半個世紀的冷戰，無數的局部戰爭和地區衝突，是其顯著特徵。……從表面上看，價值衝突的原因是市場配額的不等，利潤瓜分的不公平，生息領地的有爭議和宗教信仰的有分歧。但從實質上看，一切衝突都根源於非此即彼、主客二分、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不相容價值抉擇。”^⑥那麼，對話空間的形成和成熟，有助於在多元語境下，消除“非此即彼、主客二分、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不相容價值抉擇”。作為學術交流平台的期刊，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具有重要的支撐和扶持功能。包括《文化中國》在內的海外華文期刊，近些年來，一直嘗試在吸引多元的、不同的甚至對立/對峙立場的思想、文化、信仰等進行會面和交流，在這種文化的會面中，消解誤解，減除偏見，避免長期以來因文化偏見而形成的錯誤判斷，尤其是一些會影響大規模衝突的錯誤判斷。

對話空間的成熟，也就是從多元語境到多元文化的形成。多元文化是人類文明走向和諧共處的重要發展。經長時期的衝突和融合，實質上已經具備了本文下面論述的可以形容之為“彩虹”的文化特徵。

（二）多元語境與馬賽克文化

基本上，在跨越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將近二十年時間裡，包括《文化中國》在內的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一直推動的是以“彩虹文化”的實境下進行多元的會面和對話的工作，查閱這一個時期的刊物，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包含了：多元性、對話、互信、互動、開放、聆聽、會面、忠恕、折牆、共贏、溝通、和諧、瞭解、和好、仁愛、感通、共融，等等。

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對這種多元語境的體會可以說是感同身受。以加拿大出版的《文化中國》為例，其比較早地注意到“彩虹文化”這個命題。2000年，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Pierre Elliot Trudeau）因病去逝，死訊引發了普遍悲傷，全國上下都在懷念這位老人，《文化中國》注意到這裡有其發人深省的原因，即特魯多是西方國家最早對冷戰進行反省的領導人之一，而且也在實際上嘗試如何擺脫冷戰思維，首先建立雙語文化，尊重和保障法語和法裔文化，讓法語和英語同樣成為加拿大的法定語言，以後，隨著其他少數族裔的增加，採取了更加寬容的多元文化政策，這是全世界第一個以多元文化建國的領導人，一直到現在，加拿大還是以多元文化為建國的特徵。這是一個重要啟示，因此，當年在由該刊總編輯梁燕城撰寫的卷首論語中^⑦，首先肯定了由這種啟示導出的“彩虹文化”（Rainbow Culture），也可稱為“馬賽克文化”（Mosaic Culture），如羅馬彩拼圖，以多色融為一美麗畫圖。同樣觀察和思考當然也適用世界各國。此前

討論全球化問題時，西方社會學家也認為全球化不能只是以西方獨大的文明，不是以西方為主帶來的一種全球化，而應該是全球不同民族文化都能夠對全球有所貢獻，是另類全球化的觀念。各國在參與的時候，都把他們文化的內涵價值帶進全球化裡。這是最屬“彩虹”形態的文明。

正如我們說過，任何一本學術期刊，其支持者或主事者，不可能沒有一定的立場或信仰，或出於不同角度，觀點和觀念均有自己的一定之見，但在一個開放的文明對話時代，聆聽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學術心態。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可以有一家之言，但不能局促於一家之言，可以有不同的、差異的、衝突的甚至對立的，重要的是看到一種聆聽和對話的空間已經形成。大家致力把這種空間編成一種能容納不同域者不同色彩的對話和交流平台。大家有自己的信仰和立場，但相信自己不掌握絕對的真理解釋權。只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真理解釋方面的權力所限（即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曾經長期討論過的“有限性”問題），便可以避免文化會失去活力。因為，從歷史上看，一旦文化失去本身的活力，極易形成語言和文化的暴力。事實上，語言變成暴力，或者暴力代替語言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不但一些人成為這種暴力的受害者，而且文化所應有的對話空間便也由此壓縮，文化乃至整個文明陷入暴力循環。與之相反的“彩虹文化”（馬賽克文化）所關開的空間，使改革開放的學術期刊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每一本學術期刊，自己參與並成為這個大彩虹中的一道顏色，而自己本身也充滿不同的色彩，本身也有一個“小彩虹”。不僅是海外華文學術期刊，而且從整個華文學術界，尤其是中國大陸學術界，九十年代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除了原先占主流地位或體制內的學術刊物外，出現了一大批由民間力量創辦的期刊，其中有些在今天中國學術界有相當大的話語空間。這不是簡單辦刊的問題，而是顯示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承擔力正在擴展，由上而下，縱橫開放，參與到整個世界的文明對話過程中去了。這種在多元語境下的價值取向，是中國百餘年來所未見的，我們當值得珍惜。

（三）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國際化的若干問題

多元語境下的身份和價值取向釐清之後，我們基本能把握到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中國化與國際化關係中的一些基本原則。但是，近些年討論到華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化問題時，無法迴避技術手段改進的挑戰。

這種技術手段的改進，主要運用於傳播方法的途徑。我們尚不明確傳播技術手段改進對多元語境的直接影響，以及與學術期刊國際化的關係，在整體意義上會是如何，或者究竟會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矛盾境遇，但是起碼包括兩個最基本的層面：一是改變了學術表達所需要的工具手段，二是這種技術行為本身就是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尋求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中國文明曾以自己技術上的革命，例如造紙術和印刷術，使人類早期文明傳播和對話出現了新局面。從普遍原則講，傳播手段與學術表達應是呈正比例發展的。但這需看我們的如何把握，相關的關係可能不那麼簡單。例如，傳播手段的日益工具化和細緻化，會導致學術研究的經濟化或學術表達的經濟化，又衍生一系列外延領域，造成了更多的細分工，外圍而不是直接創造學術成果，當然不可能不稀釋具體研究領域本身的投注精力。這種更多地以外延形成的學術產業化，有助於學術期刊獲取原先並不容易的經濟利益，但可能相對減少學術研究本身的科學和成果含量。電子技術可以使人的對話和交流空前地迅速化和擴大化，但同時會帶來機械式的冷漠和制式化的虛假，這恰恰是學術對話和溝通最想避免的事物。

對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來說，在技術手段改進方面進行國際化是最得天獨厚的，包括近一二十年來的電子化。在多元語境下，從表面上看這僅是技術性的，但由於滲透了大量的文化背景元素

(例如，關於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對傳統文明的爭論是最典型的)，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所面臨的糾結，理所當然地需要得到關注。

這裡有幾個問題需要引起討論。

第一，從期刊來說，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主要特點是提供和發表研究成果，但由於原先中國文字手段具有明顯的民族性和地域文明特點，所以這種學術表達手段不僅僅是一種技術的工具理性，而也隱含著一定的文明價值。例如，文字和圖像的變化，可能動搖多元語境原本結構要素，或者起碼帶來不確定性。“書寫文化依賴於文字符號系統。文字的能指與所指是疏離的，這種疏離本身即已包含了人類思維對於外部世界的凝聚、壓縮、強調或刪除，電子媒介系統啟用了複合符號體系，影像占據了複合符號體系的首席地位。與書寫文化相比，影像與對象是合二為一的，在人們的意識中，影像就是現實本身，影像的真實外觀遮蓋了人為性的精心設計，觀眾有意無意地在其呈現形式的引導下認可或服從影像背後的某種價值體系的立場，這就是電子媒介系統的強大效果：讓觀眾在獨立自主的幻覺中接受某意義的暗示。”^②這種“暗示”，是一種不確定性，往往造成學術疏離真實的潛在危機。

第二，多元語境可能被多元技術所假冒。無論何種新技術，包括電子媒體，大量進入作為文化學科的金字塔—學術領域及其刊物，問題是這種進入並不是以學術本身含量進入參與，而是大量地利用信息傳播手段的擴展，以信息代替學術研究。信息功能大量地體現在學術領域，有一種潛在的危機，就是當信息不但大量而且形成泡沫時，實際上就是泛信息化，而泛信息化從根本上就會使學術領域消解原先的學院性、獨立性、專業性的學術特點，這樣當然會解構原先相對穩定的學術論域。一個社會，必須要承認任何一個學術領域都要有自己的學院性，要有自己的金字塔，這種特權性是一個社會必須承擔和供養的。泛信息化恰恰稀釋了這個。有學者已經擔心網絡發展會帶來某種危機：“數字化的網絡世界，雖不同於現實物理空間，但並不是虛無，而是具有虛擬性的數字化的全新世界，由於虛擬而更具隱秘性、開放性和快捷性，因而現代信息網絡世界給人類的生活、交往、思維方式帶來了美好的‘數字化樂園’，但同時，也隱藏著種種殺手和危機。”^③

第三，在學術領域，所謂“技術改進速度與學術同步發展”很可能是一廂情願的估計，事實上，熱中技術現代化會動員刊物的非學術經營。學者永遠也趕不上新技術的發展，原本可以獨立完成的，現在往往要靠一個龐大的團隊。這也是一種學術的稀釋。對大多數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來說，歷來就存在動員資源匱乏的困境，如果再陷於信息的巨大泡沫之中，選擇、過濾、篩選、提取、儲存、應用表面上看很豐富，但實質上無效勞動甚多，相對的學術科研含金量下降，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危機。

第四，由於技術手段的變化，所謂泛信息化 / 泛電子化潮流，一方面固然有助於學術“跨界”，引出許多交叉學科的出現，但另一方面卻也在某種程度上打亂傳統學科分類的嚴謹性，會打破學科分界本身潛在的分科秩序，“領域跨界”往往變成“領域混鍋”，而特定學科概念的語言定義，又容易流於大眾化甚至庸俗化。

小 結

針對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中國化與國際化關係，本文著重點是討論其在多元語境下的身份和價值取向，我們一方面看到中國本土學術期刊正在適應全球的多元語境，而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無

疑又是中國本土文化與世界交流或接軌的最恰如其分的橋樑。同時，不但由於技術手段的改進，多元語境呈現更加複雜的局面，信息的互相滲透，甚至使許多學術期刊逐漸擺脫以往固守自己專業領域的書齋風格，以更多目光隨著國際事件予以關注。從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的嬗變，華文學術期刊也擺脫不了更新和變臉的拷問。在多元語境下，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探索中國化與國際化的關係，不但發掘了更多的理論和研究資源，同時，又被迫面對一系列新的難題和挑戰。但有一點不容質疑的是，在持守學術科學本身的獨立性同時，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應充分利用自己身處多元語境的背景，適時調整本身在中國化與國際化中的獨特位置和方向，不但與國際接軌，也與古老的文明相通。曾經以文化智慧和四大發明推動世界文明進步的華人世界，同樣可以期待經過多元語境的洗禮，為世界文明對話探索新的路徑。

①為區別作為廣泛意義和特定刊物名稱，如特指加拿大期刊《文化中國》，將特別標有書名號，其餘則指廣泛意義上的“文化中國”。

②⑤⑧張立文：《儒學與網絡、生命、環境倫理》，載國際儒學會編：《儒學與當代文明》，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82、82、88頁。

③趙馥潔：《論中國哲學中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合意識及其當代意義》，載《中華文化與二十一世紀》，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611頁。

④L. 斯維德勒：《全球對話的時代》（*The Age of Global Dialogue*），“序言”，劉利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2頁。

⑥2000年12月《文化中國》卷首論語：《彩虹文化的靈魂》。

⑦陳定家：《再論互聯網與文學藝術的革新》，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

作者簡介：子夜（本名張志業），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研究員，加拿大《文化中國》執行主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研究員，上海師範大學都市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任編輯 劉澤生]